

官立男子漢文師範學堂(1920–1940)： 早期香港中文師資的重要搖籃

方駿

香港教育學院社會科學系

官立男子漢文師範學堂是二十世紀上半葉香港中文師資的主要培訓機構，其成立有助推動當時香港基礎教育的發展。本文通過搜尋各類零星的文獻資料，探討男子漢文師範學堂的沿革、師資、學生、課程及其畢業同學會的興學活動等課題，盼能盡量理清這所漸為後人淡忘的早期師範學校的發展線索，還其在香港教師教育史上的應有位置；另外是為教育工作者借鑑其教育實踐提供基礎。文末還提出一系列值得深入探究的問題。

關鍵詞：官立男子漢文師範學堂、香港教育史、師資培訓

前言

從1920年成立到1940年停辦，位於香港島的官立男子漢文師範學堂（Vernacular Normal School for Men，中文簡稱「日師」），培養了十九屆109名畢業生，出任各類官津學校的教師，為二十世紀上半葉香港的基礎教育作出一定的貢獻。然而，至今沒有一篇專文詳細地介紹或研究這所師範學校，以致它在停辦半個多世紀後，逐漸湮沒無聞，甚至連專門研究香港教育發展史的學者也誤以為它僅係「師範班」，對它與漢文中學的關係也認識不清（顧明遠、杜祖貽，2000，頁714）。香港政府自1881年開辦第一所專司教師培養的官立師範學堂（1881–1883），到1994年當局合併羅富國教育學院（1939–1994）、葛量洪教育學院（1951–1994），柏立基教育學院（1960–1994）、工商師範學院（1974–1994）和語文教育學院（1982–1994），組成香港教育學院為止，前後一共有十所以培養小學和初中教師為主的全日制師範院校在教育舞台上亮相、謝幕。它們存在的時間，短則兩年，長則超過半個世紀。其教育實踐，儘管帶有各自的時代烙印和局限，但對今天的教師教育在不同程度上仍有值得借鑑的地方。而理清這些師訓院校的發展歷程，總結其做法、經驗和教訓，則是借鑑的基礎。

本文在內容上與作者先前已發表的探討四所早期師範院校歷史的研究成果互相配合，集中探討男子師範學堂的沿革、師資、學生、課程及其畢業同學會的興學活動等方面，希望盡量理清它的發展線索，一方面還其在香港教師教育史上應有的位置，另一方面為香港教育史學家日後研究它的教育實踐以及為教育工作者借鑑其經驗和教訓提供基礎。文末還提出一系列作者認為值得進一步深入細緻研究的問題。

沿革

1920年，因學童人數急速增長而帶來對學校中文教育的殷切需求，

香港政府同時成立了兩所官立漢文師範學堂。教育當局向東華醫院借用新建的荷李活道文武廟中華書院頂樓全層，創立官立漢文男子師範學堂，由視學官余芸（1891–1966）兼任校長，專門訓練以中文授課的男性教師；同時在庇理羅士女書院設立官立漢文女子師範學堂（1920–1941），由陳逸馨女士（1894–1959）擔任校長，專門培養以中文授課的女性教師。這兩所學校都是日間上課，並且男女學生分開教育，當時人們習慣上簡稱男子師範為「日師」，女子師範為「女師」。在1926年負責培養新界鄉村教師的官立大埔師範學堂（1926–1941）成立前，日師和女師是香港僅有的兩所專司初等師資培養的全日制學校。關於兩校的成立背景，本文作者已在探討女子師範學堂發展及其教育實踐的文章中（方駿，2003，頁56–63）述及，此不贅述。

英國統治初期的香港，除了特別為西方兒童開設的學校外，其餘的基本上都是以中文為主進行教學的。1862年中央書院創立，以中文為主的學校教育開始發生變化。這所當時香港最重要的官立學校，強調中英文並重，兩者的授課時數均為每日四小時（Bickley, 1997, pp. 107–111）。1878年2月，第八任港督軒尼詩（John Pope Hennessy, 1834–1891）親自召開會議，研究在香港實行英語教學的可能性。此次會議得出的主要結論包括：政府最主要的目標應是極力推行英文教學；中英文的授課時數應是英文每天五小時，中文兩小時半；英文為必修而中文則由必修改為選修；應提高中央書院學生入學時的中文水平，以便讓他們在入學後有更多的時間學習英文（Eitel, 1983, p. 562）。1880年8月，軒尼詩又任命了一個八人教育委員會，研究將中央書院提升為高等院校的可能性等問題。兩年後委員會發表的報告書，否定了將中央書院改為高等學院的必要性，同時建議書院內學生應分為低、高兩級，低級班中英文並重，授課時數相等，高級班則除了翻譯課程尚需學習中文外，不再另授普通中文（Ng-Lun, 1984, p. 74）。委員會的成員之一，華人代表伍廷芳（1842–1922），甚至主張中央書院的學生「只准專修英文」（Cheng, 1949, pp. 410–413）。伍氏的觀點表面上是其個人的，但由於他與任命他為香港歷

史上首位華人立法局議員的軒尼詩關係密切，不難想像這其實是總督的想法。在政府積極推動發展學生英文教育的環境下，隨後的數十年裡，中文學習越來越被忽視，中文被視為土語（vernacular），連學生都看不起（許地山，1939），其結果自然是華人子弟的中文水平日漸下降。

1925年12月，周壽臣、馮平山、羅旭和、李右泉、曹允善、尹文楷、俞叔文、劉子平、李景康、李亦梅等著名香港官紳，商議請求政府撥地，創立一所漢文中學，中文科以經史為主，詞章為輔；英文、算術等學科，則仿照官立英文中學，用英文講授，務求中英文並重，使其畢業生能投考香港大學和中國內地的大學。教育司柯美（G. N. Orme，1923–1926年在任）支持這項建議，乃委派漢文視學官李景康負責草擬籌建辦法。後來活雅倫（A. E. Wood）接任教育司，繼續推動這項計劃（容宜燕，1976，頁37）。1926年3月1日，港府接管孔聖會中學，將之與男子漢文師範學堂合併，組成官立漢文中學（Vernacular Middle School），由李景康任校長，時任日師校長的黃國芳（1903–1983）則轉任漢中副校長兼師範部主任。全校分為中學、師範和高小三部（金文泰中學，1962，頁122）。

官立漢文師範學校在1926年官立漢文中學成立後，併入後者，作為一個獨立的學校，從名義上來講就不存在了，但它實際上是獨立的。除中文及經學等科目師範部與中學部的學生合班聽講外（李幼成，1971，頁50），其他如收生、學費、學制、教學實習等等，師範部與中學部都是不同的；也正因為如此，包括教育司署官員在內的不少教育界人士都繼續以男子漢文師範學堂稱之，政府年報亦多稱之為男子漢文師範學堂或位於漢文中學的漢文師範學堂（Normal School for Men at the Vernacular Middle School）（Hong Kong Government, 1938, p. 111）。本文也視1920–1926年間的日師和1927–1940年間的漢中師範部為前後相連的整體，並以日師統稱之。

1939年，港府根據英國皇家視學官賓尼（E. Burney）和法官連素（R. E. Lindsell）所提出的兩份報告書，開設官立政府師資學院（Government Training College）（羅富國教育學院，1989，頁6；

Grossman, Au, & Fang, 2002, p. 4），日師隨著1940年最後一屆畢業生離校而停辦。有論者指男子漢文師範學堂一直到1941年12月香港淪陷時才被迫關閉，這是不正確的。日師以及晚其一年停辦的女師，都和日本侵佔香港沒有關係，兩校都是因為政府師資學院的成立而停止繼續招生的。政府師資學院即羅富國教育學院的前身，後者於1994年與另外四所政府師範學院合併組成香港教育學院。在某種意義上，可以說香港教育學院濫觴於1920年成立的日師和女師。

校舍

日師前後共有三個規模極小的校舍。1920年日師建立時，政府將荷里活道文武廟中華書院的頂樓撥給日師作校舍，這一情形持續了六年。1926年日師與漢文中學合併成為漢中師範部後，改以醫院道榮華臺9–10號為其教學地點，而漢中中學部和高小部則分別假育才書社和醫院道中華會館開辦。一年後西營盤英文小學遷往英皇書院，其舊址成為漢中三部（中學部、師範部、高小部）的新校舍（金文泰中學，1962，頁49）。

1931年至1932年間，港府曾一度考慮購買寧養臺英華書院舊址作為漢中校舍，但工務局以該地面積狹小、不盡理想為由，加以反對。後來教育司活雅倫提議用西環傳染病醫院作為漢中的校舍，此建議得到醫務總監的首肯，但可惜改建工程尚未啟動，香港開始流行痘症，醫務頓時繁忙起來，遂使該醫院無法轉讓，此議被迫擱置。名商馮平山生前有鑑於漢中校舍狹小，收生受限，曾多次打算捐款籌建新的漢中校舍，可惜他於1931年逝世，此議沒來得及實現。漢中由是一直以薄扶林道西營盤小學舊址為校舍。1941年底香港淪陷時，該址遭受拆毀，十多年來所購置的儀器和圖書，蕩然無存（容宜燕，1976，頁38）。

日師早期沒有自己獨立的校舍、後期與漢中中學部及高小部共同使用西營盤英文小學的舊址這些事實，說明中文教育及中文師資的培養，在港府教育當局心目中的地位，相對而言還是偏低的。人

們難免會產生這樣的問題：當英皇書院的舊址空出後，為何不讓漢中三部直接搬遷過去，而要將之讓給西營盤小學，再由漢中接用這所英文小學的舊址？何以港府設立的全港唯一的官立漢文中學，連同日師，所擁有的辦學條件卻連一所英文小學都不如？

師資

日師前後一共有四位校長和十七名教師。學校剛開辦時，全部師資只有校長余芸和同時在香港大學兼職漢文教習的區大典，招收學生20名（Hong Kong Government, 1920, p. 07）。1920–1923年間擔任日師校長的余芸，在牛津大學取得學士學位後返港工作。1918年（一說1920年），香港第一個被委任為中文學校視學官的羅仁伯，代表教育司邀請他出任負責港島地區的視學官，而羅氏本人則專管九龍新界地區的學校。1920年日師成立後，余芸兼任校長（Yu, 1999, pp. 20–27）。余氏雖然留學西洋，但非常重視中國傳統經史，甚至強調「即使有人在香港教『八股文』，我亦不反對」。據說他以「特殊待遇」聘請前清翰林區大典（陳謙，1987，頁204）。

1923年，原任香港育才書社高級英文教員的吳鳳洲接任日師第二任校長（陳謙，1987，頁204）。翌年，吳氏調任皇仁中學中文部主任，日師校長一職由新界視學官、當時年僅二十一歲的黃國芳接任。

黃國芳是港大早期的畢業生，同李景康、港大馮平山圖書館主任陳君葆（1898–1983）、港大中文系主任許地山（1893–1941）等人過從甚密。黃氏接受西式教育，曾出版《繙譯》一書（陳君葆，1999）。在日師，除了負責行政管理之外，黃國芳還講授教學法和管理法等課程（李幼成，1971，頁50）。1926年日師「併入」漢文中學後，他仍然主管日師校務，正式職稱為漢中副校長兼師範部主任。黃氏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曾任鄉村師範專科學校（Rural Training College）校長。1954年鄉師併入葛量洪師範專科學校（Grantham Training College）後，黃氏轉任教育署高級視學官，1959年自教署退

休後，再擔任同年創辦的佛教黃鳳翎中學校長，至1968年8月離任（方駿，1999；勞滿權等，1984，頁19）。

《香港漢師畢業同學錄》將李景康（1891–1961）列為日師的最後一任校長（漢師校史編印委員會，1967，頁9），而其實他只是日師名義上的主管。李氏字鳳坡，廣東南海人，幼讀於家鄉私塾，後入香港聖士提反中學。1917年畢業於香港大學中文科，師從名儒賴際熙（1865–1937）學習中文經史。在學期間，成績優異（容宜燕，1960，頁14；賴際熙，1974，頁70）。港大畢業後出任廣東省參議，後又返港回母校聖士提反中學，任教五年。1922年，經家鄉紳商推薦，擔任南海師範學校校長。1924年應香港政府之聘，任漢文及英文視學官。他是籌辦漢文中學的主要人物之一，擔任漢中校長至1941年香港淪陷止（金文泰中學，1962，頁125）。他擅長詩文、繪畫，是位公認的傳統國學基礎深厚的學者。受其教育背景的影響，李氏對五四新文化運動所大力提倡的白話文，頗不以為然，其為文作詩從來不用白話文（陳君葆，1999；李鳳坡先生詩文集籌印委員會，1963）。

漢師的十七位講師分別是區大典、桂玷、區大原、陳堯伯、楊鐵夫、羅憇棠、白直甫、俞叔文、黃般若、張谷雛、梁廣照、鄧爾雅、譚荔垣、李幼成、岑敏仲、潘永隆、寶壽臣等人（漢師校史編印委員會，1967，頁10），其中不少是國學基礎雄厚的飽學之士。

學生

日師的目標是培養以中文授課的學校教師，故重視學生入學前的中文根基和入學後的中文訓練。投考日師的考生，必須符合下述的條件：一、年齡須滿十六歲；二、具有中文根底；三、有志於投身教育界。入學考試還包括經史算術（金文泰中學，1962，頁123）。至於入學時學生應具備的中文、經史和算術程度，因為無從查找當時使用過的入學試卷，也不見日師畢業生回憶當年學習

情形的任何文字，不得而知，想來投考者應該具備新式學校初中畢業生的水平。

用今天的標準來看，日師的規模是很小的。從表二可以看出，日師在其經辦的二十年裡，最多的一屆（1933年）畢業14名學生，有一屆（1925年）沒人畢業，平均每屆畢業人數不足6名。

表一 日師歷屆畢業生及畢業人數

年份	畢業人數	年份	畢業人數	年份	畢業人數
1922	9	1929	7	1936	12
1923	3	1930	3	1937	5
1924	8	1931	5	1938	6
1925	0	1932	4	1939	7
1926	2	1933	14	1940	10
1927	2	1934	1		
1928	7	1935	5		(總計) 109

資料來源：漢師校史編印委員會，1967，頁11-12。

表一所列的是日師的畢業生數目。但由於當時的做法是只有那些通過教育司署主持的畢業考試的師範生才能畢業，領取教師證書，二十年間就讀日師的學生總數肯定遠遠高出畢業生數目。日師創辦時，收生20人，當時的打算是從第二年起全校共收40名學生（Hong Kong Government, 1920, p. O7）。以後日師的規模相信大致維持在此水平，如1925年全校44名學生（1925, O17）。從目前所知道的五個年度（1925, 1926, 1927, 1933, 1934）日師學生的畢業考試通過率，我們可以粗略推算出它平均每年的招生人數。從表二可以看出，五個年度中，1925年參加畢業考試的3名學生中，沒有一個通過考試；而1933年則有八成多的畢業生成功通過畢業試。平均來算，日師的考試通過率為百分之三十五。若我們以此作為日師十九屆的考試通過率，則日師二十年收生人數在三百人左右，平均每屆16人左右。這離日師創辦初期每年級收生20名的情況相去不遠。

與現時的教師教育院校不同，日師要求學生穿著校服。日師的學生，無論冬夏，都得著灰布長衫，高束褲管，其式樣按二十世紀初期的書生裝束設計。日師學生走出校門，很容易被外人認出是「皇

表二 日師畢業生的考試通過率

年份	參加考試人數	通過人數	通過比率（%）
1925	3	0	0
1926	4	2	50
1927	11	2	18
1933	17	14	82
1934	4	1	25

Sources: Hong Kong Government, 1925–1927, 1933–1934.

家師範生」，畢業後是吃「皇家飯」的（陳謙，1987，頁204）。併入漢中後，日師校服與與漢中校服是否相同，不得而知，但按理相同的可能性很低。

出於對師範教育的鼓勵，與女師、埔師一樣，日師的學費也是象徵性的。自1920年創立到1940年停辦，日師的學費一直維持在每月不超過二元的水平（埔師則是全免，女師每月二元）。這樣的收費標準，比當時一般的中小學要低得多，而且中小學在這二十年間，學費有所上升。如1929年，英皇書院每月的學費是八元，日師只是一元；1933–1935年間，皇仁書院、英皇書院的學費升至每月十二元，日師的學費略有增加，為每月二元，但也只是這兩所名牌中學的六分之一。很明顯，日師等官立師範學校的大門對家境貧寒的年輕學子是敞開的。

課程

日師的學制由始至終都是二年，這與女師和埔師由最初的二年制改為後期的三、四年制有所不同。女師創立時也實行二年制，但1928年延長至四年，1938年再改為三年制；埔師則是第一屆為二年制，之後改為三年制。兩校延長學制的主要考慮是學生的基礎薄弱，兩年的學習不足以培訓出勝任的學校教師（方駿，2003，頁60）。但為何日師一直實行兩年制？本文作者沒有見到學校或教育當局正式的說明。比較合理的解釋是日師所收學生的質量相對來說比女師和埔師的高。可惜我們目前沒有日師歷年的申請數與收生數，只有1931年女師的申請數與收生數——從160名左右的申請人中錄取了43人，

錄取率略微超過四分之一（Hong Kong Government, 1931, p. O23）。二十世紀二三十年代的香港，雖然送女兒上學的家長逐漸增多，但數量仍然有限。1939年香港政府年報的數據，顯示在七至二十歲的年齡段裡，入學的男生數量遠遠超過女生。七歲以前，男女就學的機會大致相等，但這之後，差距明顯加大。九歲以後，男生就學的機會已是女生的雙倍，到了十七歲以後，更高達三倍（陸鴻基，1989，頁190；2003，頁98-99）。另外，教育司署規定，日師畢業任教官立學校、補助學校及教會學校，月薪比一般教師略高（陳謙，1987，頁202），由此大致可以推出當年申請入讀日師的人數應該不會少於申請入讀女師的，而日師收生人數卻大約只是女師的一半——1931年女師收生43人，1941年30名學生畢業（方駿，2003，頁59），所以日師的選擇面相對廣一些，學生質量也就可能好一些。至於埔師，由於其校舍位於當時被認為仍過著「半原始生活」的新界鄉村，而且畢業以後有義務去條件艱苦的鄉村學校任教（方駿，2001，頁141），對考生的吸引力肯定不如位於港島的日師。

日師的課程，一年級有經學、中西史、國文、作文、英語、世界地理、算術、代數、教授法、管理法、圖畫；二年級有經學、中西史、國文、作文、英文、世界地理、算術、代數、教育學、實習教授、圖畫（漢文中學，1928，頁15）。1929年，港府頒佈《中小學課程標準》，要求全港公私立學校依例實行。按此課程標準，小學分初、高兩級，課程包括國文、算學、歷史、地理、公民、常識、衛生、英文、體操、音樂、手工、美術等（吳倫霓霞、鄭赤琰，1989，頁177-178；香港教育資料中心，2004，頁45）。各校如要添授其他學科，需要呈報給教育司核實。作為官立師範學校，日師的課程自然應該配合政府的課程標準。照此推理，1929年以後日師的教學科目，應該還包括音樂、藝術、體育、公民、常識等等。

從1933年開始，日師與女師合請一位講師，教授兩校學生的國語（Hong Kong Government, 1933, p. O19）。這可能與當時中國政府在內地和海外大力推行國語運動有關。三十年代後期，國民政府教育部專門在國內招聘國語師資，以香港為推進華僑國語教學的中心，

在港澳、新加坡、越南、泰國、馬來亞等目標地區推廣國語（黎晉偉，1948，頁182）。日師女師的國語教師，也許是國民政府出資聘請或直接提供的。

由於時代的關係，日師的課程中，文史經學等科目學得相當深。如經學課本用商務印書館出版的《十三經》；史學用《通鑑輯覽》，旁及《三通》等；文學用《昭明文選》、《古文辭類纂》等等（陳謙，1987，頁203）。這樣偏重文史哲，應該同余芸、黃國芳、李景康等校長以及他們所延聘的多位前清翰林有相當的關係。

既然是準教師，日師的學生自然需要教學實習。1926年以後，師範生的實習非常方便，就在漢中高小部進行，不用外出尋找實習學校。但1920-1926年這段期間，學生在哪裡實習，則不得而知。作為政府師範學校，加上學生數量有限，日師在安排學生實習方面應該沒有甚麼困難。

日師學生在學期間分不分專業？是有主修、副修之分還是所有學生都讀一樣的課程和科目？筆者現時沒有看到任何材料顯示他們有主副修之選擇。考慮到當時日師的畢業生多往小學任教，而且當時的學校主要就是小學，學生分主副修科進行學習的可能性不大。

與女師、埔師一樣，日師的學生要通過由教育司署主持的最後畢業試後，方能畢業並獲取政府頒發的教師證書（Teacher's Certificate），做合格的學校教師。1932年以前，畢業考試每年均在12月舉行。1932年，由於學年開始日期由原先每年的1月1日改為9月1日，日師的畢業試改為在7月舉行（Hong Kong Government, 1935, p. 09）。畢業考試的情況怎樣？1927年的中文學校視學官報告，提供了一些線索。那年的考試由兩位校外考官進行。但到底考多少科目，校外考試官員全是教育司署負責學校教育的官員還是另外包括本港其他教育機構（如港大）的學者，並不清楚。這次視學報告稱考試十一人中只有兩人通過的結果令人失望，日師特別需要在數學及教學法（包括理論及實踐部分）加強訓練（1927, p. 023）。不難看出，畢業試至少包括數學和教學法，而中文則肯定是必考科目。考慮到日師一向重視文史教學，學生的中文水平應該不錯。

日師畢業生對社會的貢獻

由於畢業把關嚴、畢業生數量少，日師的畢業生就業毫無問題（Hong Kong Government, 1929, p. O21），他們「多派出官津學校，教國文科」（李幼成，1971，頁50）。以其平均每年畢業六人、當時學校總數過千的情況來看，日師的畢業生應是供不應求的。如表三所示，1938年全港共有1,249所學校，其中只有十五所是英文男女學校。

表三 1938年全港各類學校數目及學生數

學校類別	數目（間）	學生（人）
政府學校	20	4,580
補助英文男校	7	3,936
補助英文女校	8	2,976
補助漢文女校	3	1,101
津貼學校（市區）	161	15,165
津貼學校（農村）	119	4,407
私立學校	923	65,230

資料來源：阮柔，1948，頁37-47；陸鴻基，1983，頁234。

日師畢業生中，有成就者為數不少，這裡僅舉幾個。需要指出的是，本文作者無意也無力對日師眾多的教育前輩的成就作出評判，下面所提及的只是作者所掌握的資料相對豐富一些的幾位。

第一屆（1922年）畢業生陳本照，是日師歷屆畢業生中的佼佼者。他畢業時因成績優異，被教育司特准從區大典繼續深造，每月按官校小學教員的薪金水平領取津貼。1924年考試畢業後，在官立中學任教，旋即出任1926年始建於新界的官立大埔漢文師範學校校長，直到1941年底因日本侵佔香港而被迫停辦為止（方駿，2001）。這所二戰前新界地區的「最高學府」，是該區第一所專門培養學校漢文師資的學校。陳氏當時年僅二十六歲，就被委以如此責任，不難看出教育司署對他的重視。他工作兢兢業業，在埔師十六年，「每早七時至深夜十一時，皆在校工作，除假期外，絕無離校，十六年間，真可謂在校之日長，在家之日短」（趙世光，1957，頁24）。

香港淪陷後，流離中國南方，日本投降後返港，任職教育司署視學官，先後負責港九、新界學務。1957年自教署退休後，出任大埔師範紀念學校校長，還擔任漢師同學會理事長、監事長等職位（林伯聰，1957，頁16）。

除了陳本照以外，日師第三屆（1924）畢業生陳袞以及第十二屆（1933）畢業生鄭耀普，亦先後加入埔師任教（漢師校史編印委員會，1967，頁11-12）。埔師前後總共有七位教師，其中三位來自日師。鄭耀普戰後出任教育司署視學官十年，官校校長十多年。他以善寫詩文，工於古篆而出名（漢文師範同學會，1971，頁54）。

容宜燕，日師第六屆（1927年）畢業生，曾在英皇中學和金文泰中學任教，歷任香港仔官立學校、東院道官校、北角官校等校校長，是位在藝文上多面發展的教育家，在攝影、戲劇表演等方面卓有成就，其對香港學校詩文朗誦活動的推動，更是不遺餘力。二十世紀六七十年代香港朗誦活動的盛行，與他的組織和推動有很大的關係（柳存仁，1975，頁3）。1966年他應香港商業電台「中國文化講座」之邀，主講「詩詞淺釋與朗誦」；在此講稿基礎上編輯而成的《詩詞朗誦》，被視為香港朗誦學的開路先鋒（莫儉溥，1968，頁12）。他的其他著述如《散文朗誦》和《中學中文教學法》等書，出版後也頗受讀者好評。

日師畢業生與女師、埔師、夜師畢業生一起組成的香港漢文師範同學會，在集資辦學方面貢獻也相當大。漢師同學會最初由香港實業專科學校漢文師範科（俗稱夜師）畢業生本著「以文會友，以友輔仁」的精神，創辦於1938年。成立之初，「即有辦學部之組織」，二戰前已借用陶光學校和道傳學校，開辦兩所夜校（麥君澤，1949，頁7）。1946年，該會在教育司歷任高官羅仁伯、高詩雅、袁國煊等人的支持下，得以領取政府津貼興辦學校，凡得撥地一萬三千多呎，撥款十九萬元，漢師同學會又自籌近二十萬元，在旺角洗衣街建成一座四層樓、十八間教室、可容納1,600多名學生的校舍，於1957年落成啟用（梁端卿，1971，頁53）。後又於1964年在老虎岩開辦漢師同學會梁端卿小學，1971年在九龍石籬創辦陶秀小學，三校均為

上下午校。此外，漢師同學會還開辦多所夜校，1971年日夜校招收學生多達五千多人（陳本照，1968，頁4；劉贊成，1972，頁12-13）。

日師對香港學校的中文教育有相當的貢獻。由於日師多聘文史名家擔任教職，畢業的學生在這一方面均有一定的造詣。鄭震寰曾有這樣的評說：「漢師同學，對香港的國文教育，極有貢獻：自小學中學，以致羅師葛師的國文教師，多為漢師同學」（鄭震寰，1956，頁11）。上面所列舉的幾位日師同學，就是他們的代表。

值得進一步研究的問題

本文利用各類文獻資料，初步探討了官立男子師範學堂的發展歷程、師資、學生、課程以及畢業同學對社會的貢獻等問題，大致理清了該校經辦二十年的來龍去脈。由於原始材料的缺乏，加上作者未能聯繫到日師的任何畢業生作個別訪談，還有許多有關日師教育實踐的具體問題，仍然沒法弄清。有些問題，如始終實行兩年制的原因、在學人數、畢業生就業情況等，筆者只是根據現有的相關材料，做了一些猜測。下列這些問題，值得繼續挖掘各類材料，做進一步深入和細緻的研究：

一、日師的教學。當時學校更重視學生的學科知識培養還是更注重教學法的訓練，或者強調兩者之間的合理平衡？教師的教學方法是傳統的教師滿堂灌還是已經講求師生互動？當時的教學法只是介紹各科自己特有的教學方法還是也研討普遍性的教學理論？是介紹當時西方流行的教學理論及方法還是只講教師自己從實踐中總結出來的教學方法？

二、學生的背景和學習。日師學生的家庭背景如何？他們多數來自普通的家庭還是富裕的家庭，還是兩者兼有？他們平時住在學校的宿舍還是自己的家裡？讀書期間是大家學習同樣的課程還是有所區別？他們的課餘生活怎樣？校舍內是否有足夠的活動設施供學生使用？他們畢業後的就業情況是否非常理想，幾乎人人可以謀到教職？

三、教學實習。日師實習時間的長短如何？兩年中一共要實習幾次？每次持續的時間有多長？總實習時數需要多少？實習期間任教哪些科目？是所有的小學科目，還是重點擺在文史和數學，或由實習學校根據自身的需要來決定？教師如何評估學生的實習成績？實習在日師課程中的重要性如何？若實習不合格，學校會採取些什麼補救措施？

四、畢業考試。當時教育當局為何要舉辦校外的畢業考試？主要的考慮是什麼？由非學校教學人員出題、主持的一次性考試來決定學生兩年在校學習後的命運，合理性何在？這種做法始自何時？止於何時？考試持續多長時間？是既有筆試又有口試，還是只有其中一項？考試若不合格，是否要等一年才可以補考？每位學生最多可以補考幾次？修完所有學校課程但未能通過畢業考試的學生，是否要留級重修課程，還是可以豁免重讀只需到時應考就行？不能通過畢業考試的學生可否教書？若能，薪酬如何？日後的晉升機會如何？

值得深入探討和研究的問題當然不止上述這些。作為探討日師的第一篇專文，本文無法也不奢望弄清日師教育實踐的所有方面。希望它能夠在替日師抹去歲月的封塵的同時，為今後更深入更細緻的研究提供一個初步的基礎。

參考文獻

- 方駿(1999)。〈鄉村師範專科學校(1946-1954)：香港教師教育史上的重要一頁〉。《基礎教育學報》，第9卷第1期，頁1-19。
- 方駿(2001)。〈官立漢文大埔師範學校(1926-1941)：新界基礎教育的開拓者〉。《教育學報》，第29卷第1期，頁137-156。
- 方駿(2003)。〈官立漢文女子師範學堂(1920-1941)：香港僅有的女子師範院校〉。《教育曙光》，第48期，頁56-63。
- 阮柔(1948)。《香港教育：香港教育制度之史的研究》。香港：進步教育出版社。

- 李幼成(1971)。〈漢文師範記〉。載《漢師藝文：香港漢文師範同學會第三屆藝文展覽會專刊》(頁50)。香港：香港漢文師範同學會。
- 李鳳坡先生詩文集籌印委員會(1963)。《李景康先生詩文集》。香港：作者。
- 吳倫霓霞、鄭赤琰(1989)。〈香港華文教育與中國的關係〉。載吳倫霓霞、鄭赤琰(主編)，《兩次大戰期間在亞洲之海外華人》(頁169-185)。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
- 林伯聰(1957)〈書陳視學本照先生教思序〉。《香港漢文師範同學會會刊》，第12期，頁16。
- 柳存仁(1975)。〈《散文朗誦》序言〉。載容宜燕(編著)，《散文朗誦》(頁1-3)。香港：宏豐圖書。
- 金文泰中學(1962)。《金文泰中學新校舍落成紀念特刊》。香港：作者。
- 金文泰中學校刊編輯委員會(1996)。《金文泰中學七十周年校慶紀念特刊》。香港：金文泰中學。
- 香港教育資料中心編寫組(2004)。《香港教育發展歷程大事記》。香港：香港各界文化促進會。
- 容宜燕(1960)。〈悼念李師鳳坡校長〉。《香港漢文師範同學會會刊》，第15期，頁14。
- 容宜燕(1976)。〈金文泰中學在邁進中〉。《新教育》，第4期，頁37-40。
- 莫儉溥(1968)。〈《詩詞朗誦》序〉。載容宜燕(編著)，《詩詞朗誦》(頁1-13)。香港：齡記出版。
- 梁端卿(1971)。〈香港漢文師範同學會學校記〉。載《漢師藝文：香港漢文師範同學會第三屆藝文展覽會專刊》(頁53)。香港：香港漢文師範同學會。
- 許地山(1939)。〈一年來的香港教育及其展望〉。《大公報》，1月1日第8版。
- 麥君澤(1949)。〈我會辦學之經過〉。《香港漢文師範同學會會刊》，復刊第1期，頁7。
- 陳本照(1968)。〈(漢師同學會)校務報告〉。《香港漢文師範同學會會刊》，第21期，頁4。
- 陳君葆(1999)。《陳君葆日記》(上、下)。香港：商務印書館。
- 陳謙(1987)。《香港舊事聞見雜錄》。香港：中原出版社。

- 陸鴻基(1983)。《中國近世的教育發展》。香港：華風書局。
- 陸鴻基(1989)。〈三十年代的香港教育〉。載吳倫霓霞、鄭赤琰(主編)，《兩次大戰期間在亞洲之海外華人》(頁187–200)。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
- 陸鴻基(2003)。《從榕樹下到電腦前——香港教育的故事》。香港：進一步。
- 勞滿權等(1984)。《佛教黃鳳翎中學及佛教黃焯菴紀念安小學二十五週年紀念特刊》。香港：佛教黃鳳翎中學。
- 趙世光(1957)。〈歡宴陳本照榮休〉。《香港漢文師範同學會會刊》，第12期，頁24。
- 鄭震寰(1956)。〈漢師光榮史〉。《香港漢文師範同學會會刊》，第11期，頁11。
- 劉贊成(1972)。〈香港漢文師範同學會附設學校有限公司委託團工作簡報〉。《香港漢文師範同學會會刊》，第23期，頁12–13。
- 漢文中學(1928)。《漢文中學戊辰年刊》。香港：作者。
- 漢文師範同學會(1971)。《漢師藝文：香港漢文師範同學會第三屆藝文展覽會專刊》。香港：作者。
- 漢師校史編印委員會(1967)。《香港漢師畢業同學錄》。香港：作者。
- 黎晉偉(1948)。《香港百年史》。香港：南中編譯出版社。
- 賴際熙(1974)。《荔垞文存》。香港：學海書樓。
- 羅富國教育學院(1989)。《羅富國教育學院金禧特刊》。香港：作者。
- 顧明遠、杜祖貽(主編)(2000)。《香港教育的過去與未來》。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
- Bickley, G. (1997). *The golden needle: The biography of Frederick Stewart (1836–1889)*. Hong Kong: David C. Lam Institute for East-West Studies, Hong Kong Baptist University.
- Cheng, T. C. (1949). *The education of overseas Chinese: A comparative study of Hong Kong, Singapore, and East Indies*. Unpublished master's thesis, University of London.
- Eitel, E. J. (1983). *Europe in China*. Hong Kong: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Grossman, D., Au, S. K., & Fang, J. (Eds.). (2002). *An oral history of Hong Kong's colleges of education*. Hong Kong: Hong Kong Institute of Education.
- Hong Kong Government. (1920, 1925–1927, 1929, 1931, 1933–1935, 1938). “Report of the Director of Education for the Year 1920, 1925–1927, 1929, 1931,

1933–1935, 1938”. Administrative Report (Appendix O). Hong Kong: Government Printer.

Ng-Lun, N. H. (1984). *Interactions of East and West: Development of public education in early Hong Kong*. Hong Kong: The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

Yu, B. (1999). *The arches of the years*. Toronto: University of Toronto -York University Joint Centre for Asia Pacific Studies.

Vernacular Normal School for Men (1920-1940): An Important Cradle of Chinese Teachers in Early 20th Century Hong Kong

Jun Fang

Abstract

The Vernacular Normal School for Men was established in September 1920 by the education authorities of the Hong Kong government to solve the problem of shortage of qualified schoolteachers. Together with the Vernacular Normal School for Women and the Tai Po Vernacular Normal School, the teacher training institutes supplied majority of the qualified pre-service Chinese teachers in Hong Kong during the ensuing decades. To date, however, there is not any detailed study of the Normal School for Men, let alone specific research into particular aspects of the teacher education institute. This article, using documentary material collected from a variety of sources, discusses the School's development, staff, students, and curriculum, as well as the contributions of its alumni association to Hong Kong's school education during and beyond the decades of its existence. It also proposes a host of questions on various aspects of the School's educational practices for future scholarly research.